

11-2006

性傾向工作坊：裡裡外外的掙扎

Man Kit CHO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曹文傑 (2006)。性傾向工作坊：裡裡外外的掙扎。文化研究@嶺南，2。檢自：<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2/iss1/1/>。

This 專題文章 Fea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批判教學與文化研究

性傾向工作坊：裡裡外外的掙扎

曹文傑

文化研究碩士課程

嶺南大學

2003

Critical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Lingnan University

性傾向工作坊：裡裡外外的掙扎

導言：

本地同志運動的誕生可以追溯至七十年代末，由一連串的歷史事件孕育而成。周華山及趙文宗(1995)在《「衣櫃」性史》中指出以同性戀作為政治身份的早期同志運動與當時充斥在社會上的階級霸權、種族主義、文化論述及父權思想無法分割¹。周氏採納了John D'Emilio及Michel Foucault的觀點²，嘗試從香港七十年代，經濟因內地難民湧入而起飛及西方醫學愈被重視的趨勢，闡釋本地同性戀身份的建構過程。由七十年代本地同運的誕生至今天積極爭取權益的局面，發生在八零代的麥樂倫事件可說是同運的催化劑。在輿論廣泛報道下，有關同性戀的各種議題得以在公眾的領域內被討論，而相關的爭辯亦隨即展開。爭辯的內容總離不開討論同性戀的倫理、宗教、法律、婚姻等問題，而透過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作回應及為整個運動提供基礎便由那時開始並沿用至今。本文旨在檢視在八十年代構建的身份政治如何在十分一會為青年人提供的工作坊內重現，試圖探討這種身份政治為同運帶來的限制，並嘗試透過理解本身的限制來尋找另類平權教育的可能性。

工作坊概況：

事實上，由同志組織舉辦和協辦的工作坊由一九九零年男男肛交非刑事化後從來沒有間斷，而一九九六年由胡紅玉議員提出的《平等機會(家庭責任、性傾向及年齡)條例草案》雖然未獲通過，但卻迫使政府設立資助計劃，推動有關種族及性傾向歧視的教育工作。自此，每年均有數間獲批資助的青年中心，邀請十分一會協辦與性傾向歧視議題有關的工作坊或訪問。工作坊的內容通常都是圍繞認識性傾向、歧視的來源、個人的經驗分享等。往往，十分一會對工作坊的內容及所討論的議題都沒有太大的自主性。大部份的青年中心在發出邀請信前一般已經為工作坊的焦點、所涉及的議題深度和闊度定調，十分一會只需接受邀請並準時出席便可。

身份政治的迷思：

工作坊有關性傾向歧視的內容主要根據假想的社會現況來設計，目的是藉著工作坊來回應反同組織的指責。為了使同性戀作為一種有力的身份政治，同性戀往往被本質化為一種普遍、同質性(homogeneous)、穩定和沒有歷史脈絡的性傾向。每一位同性戀者都被假設擁有相同的經驗，追求劃一的權利，經驗相同的成長歷史。即使在工作坊上提及性傾向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下被用作劃分人類的基礎，性傾向仍然沒法脫離本質化的詮釋，最終只被陳述和理解為性醫學對人類情慾自古已有的客觀解釋。

¹ 周華山、趙文宗(1995)。《「衣櫃」性史·香港及英美同志運動》。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頁 142。

² John D'Emilio的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收錄在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ed. Ann Su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指出同性戀的政治身份是在工業革命後，個人的自主能力因經濟急速發展而大大提高，為同性戀者製造有利的社會空間去發展以個人性傾向為基礎的身份政治。

單一穩定的政治身份固然能夠發揮凝聚作用，但與此同時，被歸納在同性戀這政治旗號下的社群，她/他們之間的差異卻往往遭到忽略甚至磨平。諷刺的是，本地同運在九十年代末，經常標籤自己為追求性多元平等的社會運動，但在運動的實踐上卻對本身多元豐富的社群成分視若無睹，例如早期的同志運動對S/M、跨性別和愛滋病等議題態度曖昧，擔心與其他性弱勢社群連結會破壞經多年爭取的「正面形象」。面對著同樣的困境，英美的同志運動在八十年代初嘗試探索另類的出路，提出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強力質疑本質化的身份政治是帶來解放還是進一步的打壓。酷兒理論的掘起與後結構主義息息相關，它否定單一穩定的政治身份，嘗試透過差異政治來顛覆主流同運中的身份政治並以此開放更多的空間。Fuss(1989)在*Essentially Speaking*中對身份的理解明確地反映了酷兒理論的基本立場：

‘...[I]dentity is always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the exclusion of the Other, the repression and repudiation of non-identity’³

可是，問題並不會因為擁抱酷兒理論、放棄身份政治便會輕易解決，而是要處理一但採納身份政治所帶來的兩難局面。這種兩難局面無可避免地涉及處理同志議題先後次序的問題，即使以策略性本質主義作為選擇的倫理基礎，也無法徹底排解因本質化的身份政治對社群內實踐不同情慾模式的小眾所帶來的忽視。故此，Fuss強調，即使實行策略性本質主義，也要同時要時刻反省‘politically strategic for whom?’⁴。

非異即同？

「非異即同」的二元對立思想在工作坊上經常出現，藉此建構同性戀者在以異性戀為本位的社會中只佔有邊緣位置，是眾多的弱勢社群之一。雖然這種二分法可以幫助參與工作坊的受眾以較為簡單的概念理解同性戀者的處境，但是二分法往往被批評為鞏固支配和排他的政治策略，使雙性戀及其他情慾模式和實踐被擠在工作坊之外。Seidman(1996)對同運中出現的二元對立有以下的批評

‘Such binary oppositions are understood as categories of knowledge; they structure the way we think and organize our experience. These linguistic and discursive meanings contribute to the making of social hierarchies.’⁵

然而，二分法有助工作坊直接清晰地把異性戀者與同性戀者在公民權利各方面的不公進行對照，為爭取平等權利的同運提供簡潔有效的方法論。在這種思想主導下，同志組織往往採取公民權利的角度，重新審視現行各社會制度中對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在待遇上的差異。筆者曾在上年與一間位於慈雲山的青年中心合作舉辦工作坊，內容以人權的角度出發，於首環節以提問的方式測試參與者是否認識同性戀者面對哪些不公平的待遇，包括法律上及其他制度上的歧視。然而，工作坊背後的運

³ Fuss Diana(1989).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Politics’, *Essentially Speaking: Feminism, Nature and Difference*. New York: Routledge p.103.

⁴ Ibid. p107.

⁵ Seidman Steve (1996). ‘Deconstructing Queer Theory or the Under-theorization of the Social and Ethical’, ed. Linda Nicholson, Steve Seidman,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24-125.

作模式和理念仍然逃不開把同性戀者與異性戀者進行平行的比較，並以異性戀者現時所享有的種種社會福利與權益視為運動爭取的最終目標，缺乏對婚姻、福利制度、教育作通盤的批判。

本地婦運的啓事示：

本地婦女運動對在檢討運動策略時，也察覺到視主流為抗爭對象並力圖趕上主流為目標是過往婦女運動的盲點。梁麗清在〈選擇與局限-----香港婦女運動的回顧〉一文指出：「近年西方受到後現代女性主義的衝擊，強調差異政治。提出男女之間的差異，不是制度上造成的差距，例如同工不同酬或者是不平等政治參與機會。我們忽略的，是社會上一一直以男性的標準作為唯一的標準。因此，我們追求的平等，不應是爭取以男性標準所定的平等。」⁶可是，本地同運卻並未發展出爭取另類目標可能性。以歐美同志運動為例，爭取同性婚姻合法化成為所有同志運動參與者的共同目標，但Seidman卻擔心過於熱衷爭取現有制度的認可，很可能使我們減低警惕，不去批評制度內繼續複製不平等關係的結構：

'[Gay and Lesbian Movement] take[s] for granted a long-term monologous relationship, intraracial, intragenerational, romantic sexual and intimate values'⁷

事實上，有關爭辯同性婚姻應否成為同志運動的目標早已在歐美學術界展開，但本地同運在這方面的討論則極為匱乏⁸，而用以交流討論的平台每每限於不容置疑的人權概念。這局促的環境令到認真反省同運的討論很難展開。

個案分析：

為了回應以上對同運的反思，筆者於上月與另一間青年中心合辦工作坊時特意重新設計工作坊的內容(見附錄三)，試圖把同性戀作為政治身份放進特定的歷史脈絡、透過遊戲帶出以二元對立的觀念來討論性傾向的局限，並嘗試帶領參與者跳出二元對立，把整個工作坊的焦點放在「同性戀者是怎樣生產出來？」而不是「認識甚麼是同性戀者？」，進而欣賞多元豐富的情慾面向。在工作坊的後半部份主要討論公民權利及歧視問題。筆者希望讓參與者設身處地感受被歧視的經驗，並思考歧視背後的社會現象。然而，在工作坊舉行前的一日，社工通知筆者校方單方面把原先兩小時的活動縮短為一小時，並建議筆者只進行第一項活動，其餘的時間可作為個人經驗分享。及後，筆者亦得悉校方準備邀請明光社於下節工作坊討論同性戀的倫理問

⁶ 梁麗清(2001)。〈選擇與局限-----香港婦女運動的回顧〉，《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香港：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頁 15。

⁷ Seidman Steve (1996). 'Deconstructing Queer Theory or the Under-theorization of the Social and Ethical', ed. Linda Nicholson, Steve Seidman, *Social Postmodernism: Beyond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27

⁸ 金佩瑋曾於〈女性/同志/主義與運動〉(收錄於新婦女協進會，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社會政策研究中心(2001)。《差異與平等：香港婦女運動的新挑戰》。香港，頁 77-91)對同志運動是否必須爭取同性婚姻提出疑問：「就拿同性婚姻來說，撇開這只是有關單一長久同性戀者的事情不說，當我們明白婚姻制度是多麼的充滿問題時，我們是否還應要求同性伴侶應該有與異性伴侶一樣的權利(和義務)呢？」(頁 88)但這問題只是在整篇文章只佔少許部份。

題。明光社乃本港少數旗幟鮮明地反同的組織，由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士組成，在同性戀的議題上堅持同性戀者心理不正常、同志平權運動實質上是爭取特權及同性婚姻勢將摧毀整個婚姻制度。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變數，筆者大膽把原先設計好的工作坊內容作徹頭徹尾的修改。

對是次工作坊的反省：

原先四項的活動(詳見附錄三)由一項以看故事形式進行的活動所取代。故事內容嘗試把明光社經常對同性戀的批評創作故事主人翁的遭遇，參與者要求從文中找出反同的論點並加以批評(故事內容詳見附錄一)。當日參與學生的人數約有二十餘人，共分爲四組。於小組討論其間，筆者於各個小組穿梭，聆聽組員就故事內容的討論。筆者發覺學生每每把偏向負面的字詞或用語毫不猶豫地列爲偏見，絕大部分學生在報告時都欠缺爲論點提供理由，往往只將故事原文直接抄錄在報告紙上。在討論時間過後，筆者把各組的報告張貼出來，並詢問學生爲何把某一句或用語視爲偏見。提問的過程揭示了學生在篩選偏見時並沒有作較有系統的反省。每當學生未能回應問題時，筆者都會代她們指出把某些句子列爲偏見背後的理由，並在對話中帶入更多的資訊和更大的社會脈絡。從以上的觀察可以估計，即使明光社進行反同的工作坊，學生的反應似乎也會相約，很快便可掌握並回應講者的期望，但過程中欠缺對自己所持的價值觀作反思。

事實上這些資訊是一早編製的。在故事設計時已決定加插十項載有偏見句子，並臚列對這些偏見的分析(詳見附錄二)，而這些分析在活動完結後派發給參與的學生。分析內容主要以美國心理學協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對同性戀所進行的文獻研究爲依歸⁹，嘗試透過權威和公認的客觀科學事實指出偏見與事實不符。其中一項偏見把同性戀視爲一種需要接受心理治療的心理疾病，而筆者在分析時則以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回應，指出「美國精神學協會早在一九七三年已把同性戀從精神病的名單中剔除；而於緊隨的一九七五年，美國心理學協會亦通過決議支持上述的決定。...由至可見，聲稱同性戀爲心理疾病並不符合科學事實。」¹⁰然而，性傾向工作坊最重要的工作並不僅僅止於「客觀」知識的傳授，而是嘗試以不同的角度諸如個人的經驗分享、遊戲等爲參與者視爲理想當然的信念帶來衝擊和震撼。這些理想當然的信念比因爲無知所帶來的偏見和傷害更大更深，故此工作坊的重點應該放在意識形態的批判上。

「客觀」心理學知識難以讓參與者發生關係的原因，往往由於「客觀知識」只會淪爲對外在世界客觀的敘述，無法轉化爲生活的一部份。最諷刺的是工作坊在企圖拆毀參與者對性傾向的偏見的同時，卻透過運用心理學的研究結果重新建構一套科學的話語，把個人豐富的情慾還原爲科學的研究對象，個人對情慾經驗的詮釋權被科學知識所取代。「正常」、「合乎常態」、「健康自然」等字詞再一次在科學擁有最終詮釋權下出現，作爲對自我和對她/他人監控的基礎。性傾向在這框架下往往會被理解

⁹ 美國心理學協會於一宗 1999 年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的訴訟中提交了一份詳盡的建議書，內容綜合眾多心理學的研究結果，指出同性戀者不應被視爲心理病態。詳見 www.psyclaw.org/boyscout.html。

¹⁰ 詳見附錄二。

為人類自然而然天性的一部份，其出現的歷史脈絡和其他概念則無法進行討論，甚至完全被遺忘。

這些歷史脈絡和相關的概念便是Foucault在*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知識考古學》)中所提及的「推理性構成」(discursive formation)¹¹。Foucault把近代的西方文明史劃分為三段時期¹²，每一個時期都以某一個知識型(episteme)為中心，用以使某些話語變得可能、組織信念和概念，並生產知識的對象(objects of knowledge)¹³。要擺脫科學論述的本質主義，便需要討論這些科學知識透過甚麼「推理性構成」的機制變得可能，成為在日常中無需再三檢視的概念。Foucault於*History of Sexuality*(《性意識史》)中提供了他的看法，他認為「同性戀」一詞是在維多利亞時代性科學崛起時誕生的。性科學家以性傾向把人劃分為異性戀、同性戀及雙性戀，並以異性戀為正的性傾向模式。凡偏離預定的參考模式都被診斷為變態、心理和精神上有缺陷和異常。自此，性傾向便由個人情慾的一種表現演變成個人的性身份(Sexual Identity)。以Foucault對知識的洞察來進行性傾向工作坊，有助把參與者自身的性傾向與其他邊緣的性傾向一同歷史化(historicize)，使她/他們理解到性傾向這個概念在何種歷史脈絡下形成，並學習把這種思考方法延伸到其他社會議題上。

除了以心理學研究結果作為回應的依歸外，參與的學生與筆者在工作坊的關係也需要進一步的檢視。筆者察覺到工作坊的設計根本否定了學生的討論空間。首先，學生並無機會澄清偏見與歧視的概念，而是直觀地從文章中找出對同性戀者有負面的陳述及評價的句子。這種做法假設了學生與筆者對同性戀持有相同的價值觀，並透過這項活動強化這些價值。參與者在過程中不是學習怎樣作合理的價值判斷，而是單向地接受一套預先設定並以遊戲作為包裝招徠的價值觀。這種手法與道德教育的理念相違背。雖然羅秉祥在《繁星與道德》中批評同性戀為一種缺陷，但他正確地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機械式地灌輸一些我們接受的道德判斷給下一代，而是要幫助下一代培養出一個成熟的道德識別力(discernment)...」¹⁴。故此，工作坊應該騰出更多時間讓學生辯論，藉此澄清各自所持的價值觀念，筆者的角色應該是其中一位參與者而非最終答案的給予者。此外，先把文章假定為隱含偏見的論點使討論的空間變得狹窄，彷彿支持文中部份論點便是支持偏見，與學生習以為常的人權觀念相違背。

情慾分享：

個人(情慾)經驗分享幾乎是所有工作坊的指定環節，參與者每每期望聆聽到同性戀者在社會上遭遇欺凌逼迫的悲情故事。不論參與者是否帶著獵奇的心態，個人經驗的分享總是極具感染力，但它亦同時帶來刻板化的危機。聆聽者往往會以極為獨特的個人經驗推論出普遍描述同志社群的看法和觀感，即時把主流的戀愛情慾模式與

¹¹ 楊大春(1995)。〈方法論的概述〉，《傅柯》。台北市：生智，頁 53。

¹² 這三個時期為文藝復興時期、古典時期和現代。

¹³ Danaher Geoff, Schirato Tony and Webb Jen (2000). 'Questions of Knowledge', *Understanding Foucault*.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 23.

¹⁴ 羅秉祥(1993)。〈如何作道德判斷〉，《繁星與道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頁 3。

同性戀者進行比較，判斷異同。這種傾向使個人經驗分享的內容往往爲了爭取更多的認同和肯定而採納主流對情慾的價值標準。同性的情慾關係被陳述爲與主流異性戀者無異，兩者都是健康愉快，唯一的分別只是戀人的生理性別。個人在情慾上的掙扎和猶豫只得輕描淡寫的敘述，目的是爲了創造共同性和可比照性。

情慾橫流的故事無法在工作坊內上演，原因多不是校方或青年機構認爲故事內容不適宜，而是被同志組織進行的自我審查所剔除。同志社群所獨有的生態環境和次文化從來不會在工作坊內被高談闊論，原因是害怕把艱苦經營的共同性神話打破。對故事內容的篩選和引用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反映了工作坊內不容有掙扎和矛盾的空間。這種恐懼使筆者在工作坊內迫著自己扮演著知識的傳授者，以掌握關於同志社群最權威和準確的資料自居。事實上，把討論空間開放或許更利參與的學生發展出欣賞多元差異的視野，亦可使講者和學生的權力關係更加平等。

開放討論空間：

所謂開放討論空間，就是讓參與的學生透過提問、辯論、澄清等去建立屬於她/他們自己的價值觀和看法。本地同志運動在策略上因本質主義而帶來的困境和同性婚姻所揭示的同運目標的兩難局面都可以是工作坊的討論內容。要求參與學生思考同志社群內的差異和質疑「同志」有多大同一性都是了解社會階層的理想課題。以往這些議題在工作坊內無法開展的主因大都是筆者把自己定位爲知識的傳授與擁有者，而這個定位又會使以上討論的兩難局面浮現。

附錄三是原先設計好的工作坊大綱，內容與以往的有大幅度的修改，著重意識形態的鬆動工作。首兩個環節主要是嘗試回應在同運中性傾向被二元化的問題。雖然筆者試圖引入性傾向流動性和連續體的概念，但在討論時仍然無沒避免把性傾向還原爲三種基本的類別：同、異和雙。與以往工作坊最大的分別卻在於參與的學生已經接觸過性傾向流動性和連續體的概念，對於把性傾向分類爲三種可以解理爲權宜之策以方便討論。

總結：

工作坊毫無疑問是一個教與學的場所，講者與參與者都在同一個場所內有所得益。任何形式的教學活動都應避免只著重背誦早已篩選的知識，而是嘗試建立參與者和某一議題的關係。進行性傾向工作坊的難度在於如何在達到同運本身的目標的同時，能不斷反省自身的價值、觀念等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同志運動應思考如何擺脫回應式的政治進路，多嘗試在別人劃下的空間外積極創造新的實踐。批判教學令筆者勇於通盤檢視過往主持的工作坊，在著重變革的前提下思考另類性傾向工作坊的可能性。